韩非社会思想管窥

桂 胜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桂 胜(1961-),男,湖北黄梅人,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

内容提要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具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具体表现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社会发展思想,“竞于道德”、“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社会变迁思想,利益驱动的社会交往思想和“势”、“法”、“术”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思想。探讨韩非这些社会思想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今的社会治理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韩非 社会发展 社会交往 社会变迁 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 C 19-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5-0106-04

韩非学说的出现可说是历史的呼唤,时势的必然。战国末期,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各阶层普遍盼望安定统一。秦王政顺应时代潮流,奋六世之余烈,担当了统一全中国的历史使命。集法家大成的韩非思想体系则适应了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国家即将出现的客观形势。史书记载当未曾受到韩国重视的韩非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阅后不禁拍案叫绝,感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甚至不惜以向韩国发动战争的形式来实现他的这一愿望。韩非的学说大多被秦王朝采纳,且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本文拟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韩非的理论思想加以发掘。

一、“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的社会发展观

韩非以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持历史进化观点,将过去的历史分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三个阶段,主张“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①。要求“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②。韩非则更明确地说明历史是进化的,社会是动态的,人类生活方式是变化着

的。他通过观察和考量,把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之世四个时代。为了便于分析,现将(韩非子·五蠹)中的原文引述以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当今之世”,“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已注意到,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矛盾,强调社会治理方案要因客观实际作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圣人应做到“世异而事异”,“事异则备变”,“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③。在韩非看来,如果明知道“古今异俗”,而不能“新故异备”,仍然以古为美,必然会贻笑于天下之人。“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渚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今世者,必为新圣笑矣”^④。韩非还以“守株待

兔”、“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等形象的寓言讥讽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们同“守株”的宋人、“刻舟”的楚人、“削足”的郑人没有什么区别。韩非指出那些“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功”的“今世儒者”，“非愚则诬也”^⑤。

“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⑥，扬弃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是韩非社会发展的精义所在，也是他“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⑦的变法和法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二、“竞于道德”、“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社会变迁观

韩非从人皆挟自为心，受利益驱动事实出发，认为有欲利自私之心就免不了竞争，只不过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竞争的形式不尽相同罢了。他博古通今，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归结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并指出当今之世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韩非把竞争视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法则。他认为，不但人与人受利益驱动相互倾轧，而且国与国之际同样在较量着实力，“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人，故明君务力”^⑧。

难得可贵的是，韩非不但注意到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竞争角逐的事实，而且试图从经济发展因素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因，认为社会变迁中最大的诱因是因为物质财富特别是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竞争不是天生的人性，而是后天的人多财富等因素造成的。他把社会物质财富和人口的增长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引导人们从经济利害关系去分析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是韩非子对社会思想史的一大贡献。韩非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足食也；妇人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⑨。囿于时代与贵族阶级出身，韩非看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财富的人不敷出带来了争夺，带来了“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的事实，却忽视了社会的贫富不均的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无独有偶，19世纪初年“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饥饿、失业等痛苦不是社会阶级制度的结果，而是‘地球上人类产生过

多’的结果”，甚至主张“战争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最好方法”^⑩韩非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人类竞争和社会变迁的动因是出于物质财富的因素而与伦理道德无关。他举例说明：古代禅让是因为“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易易让”^⑪。古代人们“轻辞古之天子”，是因为象尧那样的天子，其服食还抵不上看门的，像禹那样的天子，其劳作比奴隶还辛苦；而今世的人们“难去今之县令”，争作芝麻大的县官，是因为今之县令有权有利，生则本人荣华，死则子孙泽荫，甚至几代人都有车坐^⑫。韩非由此得出结论：“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⑬。

韩非绝对地认为贫富厚寡是竞争之所然。因此，政府不要人为地缩小贫富差距，搞什么慈善、赈济。“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也。哀怜百性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受也。夫施与贫困，则功将何赏？不忍诛罚，则暴将何止？故天灾饥饿，不敢救之。何则已有功与无功同赏，夺力俭与无功无能，不正义也”^⑭。他甚至从剥削者的立场出发，反对征富济贫。《显学》说：“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韩非从竞争观点和功利主义观点出发，主张国家“以功用为之的轂”^⑮，来衡量言行，贬抑“五蠹”之人；以税赋调节贫富；以法治来维持竞争秩序，倡导公利，规范私利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奖勤罚懒、尚贤禁奸、劝农重战、富国强兵的社会理想。

他说：“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以致财富，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原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致也”^⑯。

三、利益驱动的社会交往思想

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一反孔孟学派“人性善”论调，鲜明地指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⑰。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接受了荀子关于人“生而有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等“性恶”观点，进一步指出追名求利，满足“欲利之心”是人的本性；趋利远害是人之常情。《外储说右上》说：“利之所大，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解老》说：“人无羽毛，不衣则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奸劫弑臣》又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以人之情也。”

为了构筑他的“人性趋利”学说，韩非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

舍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與,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與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医生的吮伤含血不觉得恶心,且所医治者与自己非亲非故;造车的盼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巴不得人早死,皆是受利益的驱动,谈不上什么爱恨仁慈。

韩非由此得出“人皆挟自为心”,唯利是图,并认为一切社会交往皆受利益驱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利害的关系。“王良爱马”,是为了“驰”;“越王勾践爱人”,为的是“战”^⑤;职业及交易过程中维系的杠杆是钱财。

照儒家的“亲亲”、“尊尊”观点看,人世间至爱莫过于夫妻,至亲莫过于骨肉同胞,至诚莫过于君、臣、民。韩非却以无数事实否定儒家美化的人伦,深刻地阐明:

夫妻之间是利害的关系。夫妻之间“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丈夫年五十好色不懈也,妇人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⑥。正因为夫妻之间的亲亲爱爱维系的基础是色与性,因此,妻子对丈夫常怀怵惕之心。“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⑦。卫人的妻子宁愿少赚些钱,而担心钱多了丈夫会用以买妾。

同胞之间是利害的关系。“恒公,五伯之上也,争国而杀其兄,其利大也”^⑧。

父母子女之间是利害的关系。父子之间“皆挟相为”,若“不周于己”,没有处理好抚养与赡养的利益关系,亦会埋怨责难,反目相待。《外储说左上》说:“人为婴儿,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怒;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自为而不周于为己也”。甚者,父母为了传宗接代、长远的利益,竟以“计算之心”,残害子女。《六反》说:“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衿,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更有甚者,父子之间受功名利禄驱动,会表现出惨不忍睹的行为。《说林上》讲:“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堵师赞曰:‘乐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韩非从“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⑨

之事实出发,推断臣民和君民、君臣关系毫无例外皆属于利害关系。

臣民之间是利害关系。《外储说左上》记载:“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吴起吮军人父子的创口,其爱是别有用心的,旁人不识,“伤者母”却不糊涂,深知这种爱的报答是要以付出躯身效死作代价的。

韩非反复论证人之自私和性恶,目的是要君王明白君臣之间更是受利益的驱动,是一种大利大害的关系。《难一》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提醒君王,君王的宝座是大利之所在。“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⑩。究其原因就在于“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子之死也”^⑪。韩非要人君明白君王的家庭都是以如此之心相对,更遑论那些奢望“无能而得事”、“无功而富贵”、“朋党用私”^⑫的臣下们。在韩非看来,臣下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因为“党羽不具也”^⑬，“缚于势而不得事之耳”^⑭，“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我用者也”^⑮。因此,韩非再三告诫君主不要轻信别人。妻子不可信,子女不可信,他人则更不可信。“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信人则制于人。”也就是说在“大争之世”的时代,儒家的“仁政”是行不通的。“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于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⑯。

韩非既看到社会有竞争的一面,同时也看到在利益互动的前提下,社会也可合作的一面。他的“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的论断及功利主义主张对当时及后来社会劝导耕战,发展经济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荀子言“人性恶”,但相信后天的“化性起伪”可以使人弃恶趋善。而韩非设定人性趋利且认为自私趋利的人性始终无法改变。如此定论构成了他的言论之偏激、刻薄片面,成为他主张严刑峻法,法、术、势兼治的理论根源。

四、“势”、“法”、“术”相结合的社会控制观

关于韩非“势”、“法”、“术”相结合的社会控制观,学界论术甚多,且普遍认为“势治”、“法治”、“术

治”三者之中,“法治”是核心。愚则认为“势治”是核心,理由有四:其一,“法治”、“术治”是尊隆君王的威势,以便君王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势进行统治的手段和工具。这一点,韩非讲得最明白不过:“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①。其二,势治是万能的。韩非说:“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服诸侯,以其威势也”^②;又说:“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势国危”。也就是说,势,是执法用术的先决条件。“势者,胜众之资也”^③。我已故的导师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谈道:“《韩非子·喻老》篇曰:‘势重者,人君之渊也,一言得之矣。上以威势尊严临下,高不可极,深不可测,则百官莫不悚惧敬服,左右前后,无敢疑贰,君尊而臣亦荣。’其三,‘法’、‘术’由君王设定,权势为君王独有。尽管韩非一方面理想地认为‘法者,君臣所共操也’,‘法不阿贵’^④,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立法、司法的权柄牢牢地掌握在君王的手中,‘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⑤,‘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⑥。毕竟君王权势是至高无限的,‘法’只是维护君势的手段,不能限制君王。在专制时代,天子至尊的前提下,法律的约束力往往屈服于权位的威慑力。关于法治的实质,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理解最为清楚。管子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民也’^⑦。同样,‘术’,只能是为君独有,为君势服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⑧。其四,韩非的势治理论的内容除了尊隆君王的权势而实行有效社会控制和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之辩外,还有广义上的势治,即根据社会历史趋势而变法,势是法治的前提。‘古今异势,新故异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⑨。韩非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之辩,

恰恰说明的是自然之势不易得而“法”、“术”之类的“人设之势”、“人之所得势”之可为。

韩非有感周天子式微,大权旁落的无奈,主张尊君隆势,加强势治;有感自然之势的不易得,而谋求“人设之势”;有感君王“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⑩和竞争中的大私少公,主张法治,庆赏刑罚;有感“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⑪,主张用“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⑫。

韩非的利益驱动观、竞争观、社会发展观、特别是“势”、“法”、“术”相结合的社会控制观为中国社会思想史谱写了丰富的篇章。其学说足以启思益智。

注 释:

①② 《商君书·画策》

③④⑥⑫⑬ 《韩非子·五蠹》

⑤⑨ 《韩非子·显学》

⑦⑧ 《韩非子·心度》

⑪⑮⑲⑳㉑㉒ 分别见《韩非子》一书《八说》、《忠孝》、《问辩》、《内储说下》、《难四》、《外储说右下》篇。

⑩ 详见《达尔文主义基础》206—20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3月。

⑬⑭ 《韩非子·奸劫弑臣》

⑬⑲⑳ 《韩非子·六反》

⑰ 《荀子·性恶》

⑱⑲⑳㉑㉒㉓ 《韩非子·备内》

⑳㉑㉒㉓ 分别见《韩非子》一书《人主》、《八经》、《难一》、《内储说上》、《说疑》、《难二》篇。

㉔④① 《韩非子·定法》

㉕ 《管子·任法》

(责任编辑 车 英)

On Han Fei(韩非)'s Social Concepts

Gui Sheng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Gui Sheng (1961-),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sociology.

Abstract: Han Fei (韩非) had rich social thoughts; different custom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ompetition in moral; resource-fulness and strength; gains and losses; controlment with Power, Law and Method, etc.

Keywords: Han Fei (韩非); social development; social communication; social change, social control